

中国古代忏悔意识的源起与流播

祥 耘

(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, 湖北 武汉 430073)

摘 要: 忏悔原是一种宗教仪式, 念经拜忏, 向神佛表示悔过, 请求宽恕。“禹汤罪己”就隐含了中国古代先民悔过意识。《论语》要求“内省”, 成就中国忏悔意识的雏形。司马迁《史记》有“负荆请罪”。唐明皇李隆基宠爱贵妃杨玉环, 不理朝政, 导致安史之乱、马嵬兵变、贵妃自缢。玄宗面对物是人非, 深深忏悔, 这一话题成千年文学母题之一。唐代白居易《长恨歌》、元代白朴《梧桐雨》、清代洪昇《长生殿》, 再现“长恨”与“长生”情结。《西游记》救赎意识浓厚, 具有英雄化与神话色彩。明末清初吴伟业“自恨枉节”, 成为“贰臣”, 带着沉重的精神枷锁, 进行心灵上的忏悔与救赎。“整部的《红楼梦》当中都是充满了忏悔。”贾宝玉鲜明强烈的罪感心理是其形象的一大特征。自我忏悔构成曹雪芹创作的动力, 也成为他自我救赎的契机。

关键词: 忏悔; 流播

中图分类号: I206.2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4970(2011)10-0032-04

收稿日期: 2011-02-22

基金项目: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(2009064)

作者简介: 祥耘(1972-), 男, 湖南邵东人,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, 博士, 研究方向: 现当代文学。

忏悔, 原是一种宗教仪式, 僧尼道士代人忏悔时念经文, 常称为念经拜忏, 向神佛表示悔过, 请求宽恕。今义的忏悔, 是指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或罪过而感觉痛心。有关中国文化忏悔问题的学术讨论, 有两种对立的观点, 形成学术争鸣的态势。1920 年 11 月, 周作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时, 他在对中俄文学的对比中感觉到“在中国自己谴责的精神极为缺乏。”^[1]由此形成“忏悔意识缺乏论”。然而, 早在 1901 年, 梁启超创作《说悔》, 将佛教、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皆因忏悔而并举。到了 30 年代, 张文穆《行己有耻与悔过自新》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忏悔意识。其实, 从《诗经》变风、变雅, 中经司马迁、吴伟业, 再到《红楼梦》等知名作家的作品, 都渗透了忏悔思想。

一、忏悔源于《论语》内省情结, 李、杨忏悔母题绵延千余年

悔过意识的产生, 早在“悔”字产生以前。“禹汤罪己”的历史典故“禹、汤罪己, 其兴也勃焉; 桀、纣罪人, 其亡也忽焉”, 就包含真切的悔过意识, 远古先民已经朦胧地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, 就应该悔过。孔子等儒家先哲主张“内圣外王”中的“内省”, 就是中国忏悔意识的雏形。《论语·学而》云“吾日三省吾身: 为人谋而不忠乎?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 传不习乎?”也就是每日多次反省自己有无过错, 以提高自己

的道德修养。《论语·述而》:“暴虎冯河, 死而无悔者, 吾不与也。”《论语·公冶长》:“已矣乎! 吾未见能其过而内自讼也。”这些言论要求人们学会“悔过”、“自讼”。《论语·泰伯》云“鸟之将死, 其鸣也哀; 人之将死, 其言也善。”由于种种原因, 有的人临死才良心发现, 作出忏悔。

忏悔有两种方法, 即事忏与理忏。事忏是通过实际行为来纠正自己的错误。在中国历史上, 廉颇可谓是事忏的光辉典范。司马迁专撰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, 廉颇“负荆请罪”, 表示忏悔, 显示一代大将非凡的胸襟与英雄的气魄。理忏就是自己做错事后, 自己说服自己、规范自己, 多用于宗教徒心灵洗礼, 比如《早晚功课经·邱祖忏悔文》即是理忏的典型。

在中国历史上, 皇帝乃“九五之尊”, 极少忏悔。唐玄宗的忏悔, 缘于错用奸臣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; 缘于沉湎女色, “爱江山更爱美人”, 对杨玉环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,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由开元盛世走向衰落的转折点。唐玄宗的忏悔, 更直接缘于马嵬坡事变的薄情负盟。护卫将领陈元礼激于义愤, 发动兵变, 命令士兵乱刀砍死杨国忠, 威逼唐玄宗处死杨贵妃。处死心爱的贵妃, 实非玄宗本意, 确属无奈之举。在西去成都的路上, 唐明皇最想保住的是帝位, 而军队随时还有哗变的可能, 稳定军心是当务之急。恰好此时, 成都进贡的春彩十万余匹运到扶风。他命令将

春彩全部列于大厅,召集将士们进来,悔从心中来,悲从口中出,痛哭流涕地说:

朕近来年老糊涂,托任失人,导致安禄山叛乱,不得已要远避其锋。知道你们都是仓促跟随朕上路,来不及跟父母、妻儿告别,一路跋涉,极其劳苦。朕惭愧之至。西去四川的路险阻、漫长,所经郡县房屋狭小,而人马众多,供给不免会发生问题。现在你们可以各自还家。朕独与儿孙、宦官前行入川,也完全可以走到。今天与你们诀别,你们可以共分这些春彩,以作为路费。若是回到家中,见到父母及长安父老,请代朕致意。望各自珍重。

史书上记载,唐明皇说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时,“不禁泣下沾襟”。玄宗这番话是生平难得的较为深刻的一次忏悔。将士们哪里见过贵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泪流满面的忏悔,不禁甚为感动,誓死效忠皇帝。唐玄宗笼络军心,掌握控制了护卫军,确保政权不被颠覆。

李、杨爱情故事成为后世作家千余年创作的重要题材,最著名的当推唐代白居易《长恨歌》,元代白朴《梧桐雨》与清初洪昇《长生殿》。长篇叙事诗《长恨歌》开篇以“汉皇重色思倾国”起笔,点明唐明皇忏悔的缘由。玄宗好色废政,杨妃恃宠而骄,终致引发安史之乱。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基本概括,也是诗题“长恨”的因由。从杨妃身亡始,诗情即为沉重哀伤的忏悔氛围所笼罩:

归来池苑皆依旧,太液芙蓉未央柳。芙蓉如面柳如眉,对此如何不垂泪。

春风桃李花开日,秋雨梧桐叶落时。西宫南内多秋草,落叶满阶红不扫。

梨园弟子白发新,椒房阿监青娥老。夕殿萤飞思悄然,孤灯挑尽未成眠。

迟迟钟鼓初长夜,耿耿星河欲曙天。鸳鸯瓦冷霜华重,翡翠衾寒谁与共?

悠悠生死别经年,魂魄不曾来入梦。^{[2]349}

君王与爱妃虽然梦想“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”,此生此世无法实现,只有永难消解的“长恨”了。最末点明全诗的主题: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恨绵绵无绝期!唐玄宗的悔恨与天地同在,普天之下怨男痴女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,心灵受到震撼。

元朝著名剧作家白朴有感于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“秋雨梧桐叶落时”一句,抓住梧桐细节,创作《梧桐雨》。第四折是全剧最精彩部分,写李隆基怀着忏悔之心,追忆过去的月夕花朝。在落叶满阶的气氛中,李隆基做了一个朦朦胧胧的梦,梦中杨玉环请他到长生殿摆宴,不料才说了两句话,梦却被惊醒了。“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”,这雨声紧一阵慢一阵,淅淅沥沥,“一点点滴人心碎”,淋漓尽致地烘托出李隆基悲凉悔

过的心境。

康熙剧坛上最成功、最有影响的作品是洪昇的《长生殿》。“纵使元人多院本,勾栏争唱孔洪词。”《长生殿》演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历史故事,习称“天宝遗事”。在马嵬悲剧《埋玉》一折戏中,陈元礼向明皇施压“臣启陛下,贵妃虽则无罪,国忠实其亲兄,今在陛下左右,军心不安。若军心安,则陛下安,愿乞三思。”安史之乱,国破家亡,缘于唐明皇迷恋杨贵妃,继而重用杨国忠,杀杨氏兄妹,以平国人之愤。这就成为唐玄宗深沉忏悔的负罪原因。唐明皇不断地寻找精神救赎的途径与方法,通过为杨妃建造道观庙宇、雕刻塑像等方法来减缓内心的痛苦。“只念妃子为国捐躯,无可表白,特敕成都府建庙一座。又选巧手匠人将旂檀雕成妃子像……亲自送入庙中供养。”对于唐明皇来说,只要能赎生前的负情之罪,付出生命也无怨无悔。他甘愿赴杳冥以自赎:

【武陵花】只悔仓皇负了卿,负了卿!我独在人间委实的愿生。语婷婷,相将早晚伴幽冥。(《闻铃》)

【五煞】与你同穴葬,做一株冢边连理,化一对墓顶鸳鸯。(《哭像》)

最后唐明皇如愿飞升得与杨贵妃相见,亲自说出心中的忏悔:

【豆叶黄】乍相逢执手,病咽难言。想当日玉折香摧,都只为时衰力软,累伊冤惨,尽咱罪愆。到今日满心惭愧,到今日满心惭愧,诉不出相思万万千。

李隆基在马嵬事变中,背离了已有的真情轨道,“空做一朝天子,竟成千古忍人”。江山社稷,不属己有,钟情的美人又香魂飘散,痛定思痛,终于走上了救赎之路。当然,杨妃也有忏悔精神和负罪意识,也主要表现在马嵬事变之后。她的忏悔主要是对国家和民族深怀的负罪之感。^[3]

《长生殿》将《长恨歌》里无法实现的幻景,化作了幻想中实现了的美好愿望,以精神的“长生”,消解了现实中的“长恨”,重新弘扬了晚明的尚情思想。

在中国文学史上,许多正直的文人体恤百姓苦难,反观自身奢华,忏悔之情溢于诗文之中。比如,白居易《观刈麦》写了农民在酷热夏天的劳碌,而自己“不事农桑”却拿“三百石”俸禄,到年终还有“余粮”,因而“念此私自愧,尽日不能忘”。欧阳修《食糟民》体现自己罪感的心理“嗟彼官吏者,其职称长民。衣食不蚕耕,所学义与仁。仁当养人义适宜,言可闻达力可施。上不能宽国之利,下不能饱尔之饥。我饮酒,尔食糟,尔虽不我责,我责何由逃。”这样的句式直接出现在诗中,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恳切的忏悔之情。因而,在忏悔意义上重新理解这类诗作,是很有必要的。对整个古代文学而言,这也不失为一个新的诠释视

角。^[4]

《散家财天赐老生儿》塑造了忏悔的富商形象刘从善,“今日老的为没儿女,不昧神天,回心忏悔”^{[5]373}。刘从善表白内心“我今日个散钱波把穷民来济,悔罪波将神灵来告:则待要向天公赎买一个儿。”明代凌濛初编撰《占家财狠婿妒侄,延亲脉孝女藏儿》,以小说形式改编剧本《散家财天赐老生儿》,同样展示了刘从善忏悔的心态与散财自赎过程。冯梦龙“三言”中《桂员外途穷忏悔》、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塑造了忏悔商贾。李梦阳是明中叶复古派的开创者,又是自省与自赎的先驱。“于今将四十,始悟昔年非。”这种悟悔之情,在前七子中有普遍性。何景明自省自赎,著有《樊懋昭墓志铭》。王廷相自称“行年四十觉前非”^{[6]315}。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省悔精神。谢榛“绿发稍变白,临海悔已迟”^{[7]2},吴国伦“幡然悟昔非”^{[8]432}。著名学者陈书录先生致力于元明文学商贾忏悔的研究,认为明代复古派如前后七子有自省自悔,革新派如公安派袁中道深受商贾忏悔的影响。徽商吴文明、吴元询等以散财积善的方式自赎,深深打动了袁中道,使他破例为他们立传。袁中道“深自悔恨”,标志着公安派在自省自悔中从性灵张扬、激情狂放的浪漫主义回归到传统的古典美学。^[9]明朝文人们的这种自悔自赎,成为明朝文艺启蒙思想的一种标志。袁中道的《心律》、张岱的《自为墓志铭》被学界视为《忏悔录》式作品,而时间上要比卢梭的《忏悔录》早一百余年。

二、《西游记》救赎意识浓厚,《红楼梦》忏悔主旨鲜明

《西游记》救赎意识浓厚,具有英雄化与神化色彩。唐僧今生无罪,但前世有宿罪,取得真经后,如来解释“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,名唤金蝉子,因为汝不听话,轻慢我之大教,故贬汝之真灵,转生东土。”三个徒弟西游主要是赎罪,孙悟空大闹天宫;猪八戒因调戏嫦娥,故而“在福灵山云栈洞造业”;沙悟净因打碎玻璃盏被贬下凡,伤生吃人造业。他们犯有信仰罪、破坏秩序罪、道德罪和过失罪。这里反复强调的是神的意志,罪主要来自于对“天条”即封建秩序的破坏,赎罪则要求归附秩序和忠诚。救赎形式有堕落、德罚、忏悔、苦行和自新,经受“苦难”则是救赎的途径。《西游记》所代表的民间佛教文化,是乐感文化,反映了对富足自由极乐世界的向往;是外求式救赎,注重感性信仰。^[10]

作为明末清初之际的变节“贰臣”吴伟业“自恨枉节”,带着沉重的精神枷锁,进行心灵的自赎。这位名垂一时的江南才子崇祯年间中了进士,曾主持湖广乡

试,为海内贤大夫领袖。可惜他生不逢时,命途多舛,仕明而明亡,不愿仕清而违心仕清。仕清以后的岁月,便是他内心的良知不断拷问灵魂的忏悔岁月。翻开《梅村家藏稿》后集,触目尽是缠绵入骨的痛悔,那铺天盖地的凄怆,如子规啼血,旁人不忍听闻。如《过淮阴有感》云“浮生所欠止一死,尘世无由识九环。我本淮王旧鸡犬,不随仙去落人间。”只因他“浮生所欠止一死”,他才担当起比死还难受的生之重担。他的满腔悲愤,都从诗里喷薄而出,他的诗里有他的泪痕,有他的血痕。^{[11]271}吴伟业饱含血泪为自己的失节忏悔,但他不是一味贬抑自我,而是靠种种自辩努力坚守存身自保的道德底线。(梅村)性至孝,生际鼎革,有亲在,不能不依违顾恋,俯仰身世,每自伤也。”^{[12]1356}以“孝”代“忠”,以“情”代“义”,在此,吴伟业未殉国而仕清廷,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、可以谅解的行为。正是他的忏悔、他的自辩、他引以为耻的“贰臣”遭遇,投射到他的诗歌中,使得其诗流光溢彩,冠绝千古。而我们后人谈起他,更多的是对其诗的赞赏与对其遭遇的嗟叹。可以说,吴伟业用自己的诗歌赢得后世的理解与宽容,这也应该算是他痛苦一生的慰藉。^[13]

《红楼梦》的问世掀起了一股“红学”潮流。早在1876年,江顺诒在《谈〈红楼梦〉杂记》一文中就指出它是“作者自道其生平”,“自忏自悔”之作。王国维认为《红楼梦》之精神是“自犯罪,自加罪,自忏悔,自解脱”^{[14]252}。胡适也在《红楼梦考证》中指出,《红楼梦》的忏悔因素颇为明显。鲁迅研究后认为“据本书自说,则仅乃如实叙写,绝无讥悼,独于自身,深所忏悔。”^{[15]238}卢梭于1761年开始写作《忏悔录》,而1763年,也就是他开始创作的第三年,曹雪芹就去世了。在一定程度上说,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代忏悔意识集大成之作。胡适早就认定《红楼梦》是“曹雪芹的自叙传”。因此,在某种意义上,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代社会“忏悔录”的光辉典范之作。

在第一回中,作者自云“今风尘碌碌,一事无成,……实愧则有余,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!当此,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,锦衣纨绔之时,饫甘餍肥之日,背父兄教育之恩,负师友规训之德,以致今日一技无成,半生潦倒之罪,编述一集,以告天下人:知我之负罪固多……”自我忏悔构成曹雪芹写作的原动力,写作又成为曹雪芹自我救赎的契机。《红楼梦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小说形式进行自我解剖的内省文本。曹雪芹编纂书毕,自题一绝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”,把“言”与“泪”交织在一起,满纸自怜,“字字看来皆是血”,故脂批曰“情文”。明知其荒谬无用而又不得不以忏悔之心“哭成此书”。这是《红楼梦》写作动机的曲折杂难的自我剖白。曹雪芹

是以小说形式通过想象中的人物的生活、思想和感情,来抒发自己的情怀,一方面弥补心理上的悔恨,一方面又勾勒出个人才情的价值观来颠覆甚或对抗儒家思想。^[16]曹雪芹通过自己《忏悔录》式的书写,为中国封建社会唱响了一曲挽歌。《红楼梦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缩影。

贾宝玉鲜明、强烈的罪感心理是其形象的一大特征。他自认为“枉入红尘若许年”,因此“自怨自叹,日夜悲号惭愧”,发出了“无才可去补苍天”的感慨。他的自轻自贱就是罪感心理的表现与流露。贾宝玉奉行“不读圣贤书、不走科举路、不做当官梦”的“三不主义”,但他却深深感到这样做是有负“天恩祖德”的,是对君对父的犯罪,所以郁结于胸的是满腔的负罪感。王蒙认为“整部的《红楼梦》都充满了忏悔”^[17]1098。曹雪芹把这种罪感、忏悔化为创作的动力。他希求通过“编述”自己的“半生潦倒之罪”以自慰、自赎,在“蓬牖茅椽,绳床瓦砾”的处境中提笔直书,希望以此来向国家、向君父负荆请罪。故而贾宝玉表现出来的罪感心理又表现为一种救赎行为。^[18]曹雪芹借喻荒谬的神话,认定贾宝玉是当年女娲所遗弃的一块顽石,不能担负起自己应有的使命。第三回贾宝玉刚一出场,作者就进行了辛辣的谴责与嘲讽“纵然生得好皮囊,腹内原来草莽。潦倒不通庶务,愚顽怕读文章;行为偏僻性乖张,那管世人诽谤。”进而痛心疾首地指责他“富贵不知乐业”,“可怜辜负好时光,于国于家无望”。这番评语形象地再现了贾宝玉鲜明而浓厚的忏悔意识。

著名学者朱寿桐研究后认为,隐现在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中的浓厚的忏悔情绪,在后续的四十回中便为诸多人事的变故所冲淡,所湮没。这恐怕一是高鹗并未清晰地把准曹雪芹的忏悔主旨,二是续书作者毕竟没有原作者的那种切身体验,即使弄清了原著原旨,谅也不能传达得差强人意。张锦池认定高鹗的续书与原书“在基本思想倾向上却貌合神离”^[19]343,从忏悔主旨的贯彻这一角度看,是颇为贴切的。如果单是刻画一种叛逆性格,许多人都能凭借想象加以组构,但要写出符合原著出语情境的忏悔情绪,则非有类似经历和同等情怀的作者都难以勉强,这也是《红楼梦》续书虽多,却无一能与原著比肩的一个重要原因。^[20]

“忏悔”话题为当下我国言语活动中一种时髦现象,备受学界瞩目。这是因为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

型时期,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社会,唯利是图,贪污腐化,人们道德信仰遭受危机。“忏悔”成为热门话题,究其实质,是社会大众心理对道德良知和真诚的渴求与期待。在当下社会的语境下,梳理中国古代忏悔意识的缘起与流播,作为现实社会人们心灵的参照与坐标,自然具有积极意义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周作人.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[N]. 晨报: 副刊, 1920 - 11 - 15.
- [2] 袁行霈. 中国文学史: 第二卷[M]. 北京: 高等教育出版社, 1999.
- [3] 李振中. 忏悔灵魂的救赎[J]. 四川戏剧 2007(4).
- [4] 杨金文. 忏悔观念与中国文化之悔过精神[J]. 现代哲学 2007(6).
- [5] 臧晋叔. 元曲选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9.
- [6] 王廷相. 王廷相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2.
- [7] 谢榛. 谢榛全集校笺: 卷一[M]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2003.
- [8] 吴国伦. 甌甌洞稿: 卷三十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.
- [9] 陈书录. 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[J].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7(3).
- [10] 王敏. 《神曲》与《西游记》救赎意识之比较[J].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(1).
- [11] 陈子展. 中国文学史讲话[M]. 北京: 北新书局, 1937.
- [12] 赵尔巽. 清史稿·文苑传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6.
- [13] 罗燕, 周加胜. 沉重枷锁下的心灵自赎[J]. 黄石理工学院学报 2007(1).
- [14] 一粟.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·红楼梦卷: 第一册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
- [15] 鲁迅. 鲁迅全集: 第9册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2.
- [16] 余珍珠. 忏悔与超脱《红楼梦》中的自我书写[J]. 红楼梦学刊, 1997(1).
- [17] 王蒙. 双飞翼[M].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96.
- [18] 张乃良. 贾宝玉罪感心理的文化分析[J]. 南都学坛, 2007(1).
- [19] 张锦池. 红楼十二论[M].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1982.
- [20] 朱寿桐. 《红楼梦》忏悔主旨论[J].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1(2).

[责任编辑 杨 倩]